

· 名家访谈 ·

#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探索者

## ——戴伟华教授访谈录

戴伟华, 陈景春



戴伟华, 江苏泰州人, 文学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唐代文学研究。1993年获“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1998年被评为江苏省普通高校跨世纪学术带头人。1999年2月获准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2000年起, 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特聘教授、二级教授,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重点优势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带头人; 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2项、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1项、广东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2项、广东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1项。两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结项“优秀”等级, 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综合研究”。

戴伟华教授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地域文化和文人分布问题: 以唐代使府为中心”“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强、弱势文化形态与唐诗创作关系研究”。

出版专著《唐代幕府与文学》《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 论文集《唐代文学综论》《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等; 发表论文《独白: 中国诗歌的一种表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论五言诗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李白自述待诏翰林相关事由辨析》(《文学遗产》)《张九龄“为土著姓”发微》(《文学遗产》)《论〈河岳英灵集〉初选及其诗史意义》(《文学评论》)《佛教转读与四声发现献疑》(《世界宗教研究》)《唐宋词曲关系新探》(《音乐研究》)《〈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历史研究》)等100余篇。

## 交叉学科的视野:

## 激发古代文学研究新活力的重要途径

陈(景春,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戴教授,您好!据悉,近期您申报的“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综合研究”获批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在此要向您表示祝贺。

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谢谢。

陈:就您本次申报的课题来看,您是希望从“文化生态”的宽广角度去探讨唐代诗歌的生成、发展与表现形态,这是不是一种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的视野?

戴:是的。我本人很赞赏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旧话题,20世纪学者们在交叉学科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闻一多先生在论述《诗经·芣苢》时,从语言学、生物学、社会学等角度阐述了这首诗的文化内涵,对《九歌》的阐释闻先生是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其研究方法给人们的启示非常深刻。陈寅恪先生的唐研究,“以诗证史”,开学界风气之先,进一步丰富了唐诗的认识价值。文学史上讨论诗歌起源问题,往往大同小异;但民族学工作者近年来以田野作业的方法搜集了一些近代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民族的生活资料,用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歌传唱说明艺术起源于原始宗教或原始巫术,这比过去“文学起源于劳动”的单一观点有所进展,也更为全面。事实证明,古代文学有许多问题的解决是依靠相邻学科的发展来完成的。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应该提倡。

1987年我曾设计了一个课题来讨论文风嬗变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其中《屈赋与唐诗——对唐诗“文”、“质”之变的理论考察》可以算是开始关注唐代文学与地域文化这一研究范围。后来慢慢深入系统做下去,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到《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我试图将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一以贯之。

陈:原来交叉学科研究古代文学还是旧话题,我还以为您的研究理路是赶了时髦呢。众所周知,近十几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已渐渐地从传统文史结合进一步扩展细化,涌现出如地域与文学、制度与文学、音乐与文学、经学与文学等学术热点。与之相应,在多学科交叉视野下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也就成为时

颇为盛行的研究方法。

戴:学问不能赶时髦,不能哪种研究方法时髦就采用哪种方法。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事项,放在较宽广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这不是趋一时之风气,而是由研究资料与对象的本质决定的,是文学研究向深层次展开的客观选择。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是符合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的,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清晰合理的。以“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这个课题来说,首先是“文化生态”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事实上,在唐代诗歌与文化生态关系的论述中,文化生态就是对唐代诗歌的外延诉求和动态描述。从研究策略而言,概念的动态化不是为了追求方法论的创新、追求时髦,而是凸显了寻求解决文学史中实际问题的努力。

有人说,有一种成功叫坚持!我不去追逐时髦,当然,如果把基于研究对象不断更新工具、不断寻找有效的方法进行创新研究理解为追求“时髦”,那我认同这种做法。

陈:您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事项来研究,充分考察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地域背景、时代风气,从多个视角立体地再现唐代诗人的创作状态,图解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画面,更深入地揭示唐代诗歌的内涵。

戴:不错,正是这样。

陈:这的确是促进古代文学研究向深层次展开的极佳视野。显然,在您的学术研究中,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是激发古代文学研究新活力的重要途径,请您谈谈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戴:我以《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其中阐述了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一是交叉研究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是学科交叉研究古代文学的范例,其《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云:“这本书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的课题,是想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式沟通,撷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

研究的素材和前资。”这一研究方法的涵盖面远远不止文史沟通,而是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二是在交叉学科中有利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交叉研究不仅是工作思路,而且要通过交叉研究得出新颖而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才是学科交叉研究的目的,也就是要解决问题。任中敏先生的唐代音乐与文学研究开创了一个领域,解决或部分解决了文学史中的一些遗留问题。比如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多种说法,而任先生是从音乐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的,从文化层面揭示了词调的发生过程。

在学科交叉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其实并不容易,困难之一就是与古代文学发生关系的交叉学科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比如说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作为搞文学出身的人,对史学的知识准备就会不够。这里举一个例子,传统观点认为,王维的《使至塞上》创作背景为开元二十五年春或夏,王维奉唐玄宗之命,以监察御史赴西北边塞慰问战胜吐蕃的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回避了这一问题,没有说明王维赴崔希逸幕和崔希逸破吐蕃之间的关系。其实,只要确定崔希逸破吐蕃的时间即可明了。《旧唐书》《资治通鉴》均记载崔希逸破吐蕃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己亥,然而据王维在河西所写《为崔常侍谢赐物表》和《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可以考知开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前,崔希逸征讨吐蕃战事尚未发生。战事的具体时间可通过樊衡《河西破吐蕃贼露布》断定为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其中还表明了破吐蕃之远因是吐蕃不听玄宗劝阻,攻杀唐朝属国勃律,玄宗大怒之下准备还击;近因是唐军表面示好吐蕃,可乘其不备而掩杀之。又根据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开元二十五年冬,勃律为吐蕃所破。据此可知,《旧唐书》勃律“二十二年,为吐蕃所破”记载有误,《露布》及吐蕃史料均证明王维材料的真实性。对这一时间点的考证可以证明王维《使至塞上》一诗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我把以上思路形成了《〈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一文,这一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陈:您刚才所举之例是文史互证的视角。除此之外,您还成功地从音乐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并在《世界宗教研究》《音乐研究》上发表大作,能否借此谈谈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操作要点?

戴:交叉学科之间的互证是考证的手段之一,通

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联系史实,进而发现问题;并通过地下出土文献与纸上文献相参证得出结论,文史互证,上例以吐蕃《大事纪年》等文献来订正《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之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另外,真正意义上的在交叉学科中研究古代文学需要时间做保证:一是去熟悉另一学科需要时间;一是交叉视野中的新课题需要以完备准确的资料为基础,而这更需要时间。尽管如此,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仍然有吸引力,它迫使我们不断去学习新知识,同样也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收获。

#### “辨章学术”的承继:实证治学的文化依归

陈:在您刚才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您特别重视文献考据、辑佚辨伪,这是乾嘉学派重要的治学方法,主要运用于文献学。您认可这种方法吗?

戴:乾嘉学术是乾隆、嘉庆时期出现的以考据为治学方法的学术学派。其中,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术的重要分支。扬州学派师法戴震,治学严谨、考证精详,既博大精深又敢于创新。乾嘉学术(包括扬州学派)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经学、音韵、训诂,并涵盖史学、文学、天文、地理等等,在学术史上有校正风气、传承国故的贡献,其局限是过于重秦汉而轻近古,繁琐细碎乃至不近世务。近代以来的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钱锺书等学者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创新并发扬了乾嘉学术(包括扬州学派)所倡导的实证治学精神。

其实我对乾嘉学术所擅长的经学、音韵、训诂知之不多。我在扬州读书、工作二十余年,这里的学术氛围深受乾嘉学术影响,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师友们就有不少是熟谙考据之道的,潜移默化之下,我也略知一二;其次而言,我对于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如阮元、王氏父子,以及近代以来承传实证治学精神的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学者怀抱敬畏之情,并试图从中吸取学术力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目录学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也正适合古代文学研究。从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我对乾嘉学术所倡导的实证治学之风有文化上的自觉依归。

我以为,实证治学的关键是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以考据为方法,以问题为指向,回应、解决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此举一例,唐人选唐诗的系列中《河岳英灵集》影响较大,但是其成书过程由于版本的不同而存疑不少。我以《河岳英灵集》的成书过程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通过将日本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古抄本《文镜秘府论》南卷所收录《河岳英灵集》之《叙》《论》和《文苑英华》本以及通行本之间的成书时间、收录诗人数目、收录诗作数量作比较,清晰地再现出《河岳英灵集》一书产生的过程,同时搞清楚了“起甲寅”的缘由。

陈:在您的论著中,经常会提到任中敏、傅璇琮、王昆吾等先生,请问这些学者是如何影响您?您又是如何继承和发挥他们的学术的?

戴:任中敏先生是一代词曲大师,是新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在学界有崇高的地位。1918年,任先生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追随词曲大师吴梅先生。毕业后,他留居吴先生“奢摩他室”书斋,两年时间读尽吴先生收藏的词曲典籍。在1980年以前的四十余年时间里,任先生辗转流离,在极为艰苦的政治环境、生活条件下,完成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两书,撰写了《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和《优语集》,学界为之震撼。1956年,任先生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一文中描述了其学术追求:对唐代结合音乐的词章和伎艺作了全面研究。

任先生于我而言,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于其深邃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还在于他追求学问的超凡毅力。任先生的工作程序和著述体例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唐声诗》《唐戏弄》都是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揭示文学现象后面的事物运行规律,建构自足的文艺体系。其著作通常是上下两册,文献资料整理与理论阐述各为一册。我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和《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两书事实上就是任先生著作上下册形式的呈现。我和博士生张之为历时两年完成了任先生《唐声诗》校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在表达对任先生的敬意。

傅璇琮先生是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古籍整理专家和出版家,是当前学界最突出的领军人物之一,学术成果丰硕,其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编纂体《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唐才子传校笺》《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一部部

鸿篇巨著成为文史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

傅先生于我而言,如师如友。他对我既有学术理路的指引之功,更有对后学奖掖提携之情。傅先生精于考据与文献,治学路数近于岑仲勉先生,更继承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途。诚如傅先生所云“陈寅恪难于超越之处,是他的通识,或用他的话来说,是学术上的一种‘理性’。这就是经过他的引证和考析,各个看来零散的部分综合到一个新的整体中,达到一种完全崭新的整体的认识。”傅先生所倡导的文化角度和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已成为近二三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学风,对后学影响巨大。傅先生对我辈学者颇多奖掖,自我的第一本专著《唐代幕府与文学》纳入傅先生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以来,傅先生开始了对我学术研究的鼓励和支持。他在为我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作序时说到“他来信要我作序,我觉得在当前出版难,写书难,特别是搞考证资料难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我是理应为这部著作说几句话的。这不但是为伟华同志本人,也是为了在目前这样一种特殊学术氛围中相濡以沫。”他在《文学遗产》发表的论文中还说“戴伟华先生即专注于唐代方镇幕府与文学的研究,撰写有《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书,在这方面极有开拓之功。”傅先生对后学的奖掖无疑让人感动。

王昆吾师是任中敏先生的得意门生,硕士期间师从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专攻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阶段转为隋唐燕乐歌辞研究。王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王师80年代已蜚声学界,曾是上海师范大学(兼扬州大学)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首席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文学中的音乐文学、神话学、域外汉文学及文献学,著作有《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唐代酒令艺术》《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隋唐音乐及其周边》等十多种。

王师继承综合了王运熙老先生“天子狩猎”式(目录学指引)的治学方法和任中敏老先生“大禹治水”式(穷尽所有的资料)的治学方法,强调资料与理论并举,每做一项研究,都是从资料搜集和整理入手,而且尽可能穷尽原始文献。比如他在撰写博士论文前,先编定了120万字的资料书——《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然后再写《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

辞研究》,可谓资料基础扎实、理论研究先进。为此,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得了很多奖励,包括中国图书奖的荣誉奖、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等等。这些成功意味着一种学术方法的成功,王师将其成功之治学方法传授给了博士生们,要求我们先做资料考订,再写学位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就是这样完成的。

### 持之以恒的追求: 唐文学研究的辛勤耕耘者

陈: 众所周知,唐代文史研究名家辈出,比如陈寅恪、岑仲勉、任中敏、程千帆、傅璇琮以及台湾地区的罗联添、严耕望等。相比较而言,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也远远多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段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何还要选择唐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

戴: 研究唐代文学的人是很多,而且名家辈出、成果丰硕。除了你刚才所举的之外,像当今继续领衔学界的周勋初、罗宗强、王昆吾、葛晓音、陈尚君等教授,在唐代文学的研究中都成就卓著。耕耘的人多了,要出高质量的成果其难度也就更大了。这确实是学者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之所以选择唐代文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唐代文学的浓厚兴趣。我是恢复高考后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早期的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术氛围很好,有师从容庚专攻“小学”的王善业、唐史专家李廷先、王国维研究专家谭佛维、戏曲研究专家徐沁君等,后来又来了一代词曲大师任中敏。还有历史系教授卞孝萱先生,他曾助范文澜编纂《中国通史》。我1982年1月留校后,又幸遇葛兆光先生来学校工作,我的第一本著作《唐代幕府与文学》的写作和出版也得到葛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大学时代最感兴趣的是充满美感的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我喜欢去描写接触唐诗的最初印象,还喜欢模仿和创作古典诗词。我试图在唐人的诗歌咏唱中来印证自己对自然人生的体会,甚或以自己的创作来和古人作比较。很长时间我就是这样用情感去贴近古人,和大唐文化对话。有一段时间我曾跟随赵继武先生学习格律诗的写作,几近入魔。赵先生和胡乔木是中学同学,和沈祖棻是大学同学,他是老派学者,述而不作,对传统文化修养极深厚。虽然写作和以后走学术研究一路并不是一回事,但这一时段的学习对我体会古代作品甚有帮助。其后,我的兴趣逐步向研究靠近,在阅读中发现了一

些问题,于是开始逐步深入,想探究历史文化原貌,试图解决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我选择唐代文学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80多岁的任中敏先生回归故里,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来到了扬州师范学院工作,任先生学力深厚、成果丰硕,在学界威望很高,是我国著名的词曲学家、戏曲学家、敦煌学家。当年任先生申报硕士生导师时,朱东润等老先生认为,任先生如果不能做博士生导师,那他们也做不了博导了,所以批下来的是博士生导师,这也是学界佳话。任先生无形中给扬州师范学院竖起了新的学术标杆,也激励着我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对唐代文学的更加热爱,想做出一番大事业。

陈: 很多学者的学术起点在于其博士论文,可是据了解,您的学术起点却是始于硕士论文,能否借此谈谈您的学术领域和影响?

戴: 1986年,我以中唐边塞诗为题做硕士论文,其创新之处有二:一是提出中唐边塞诗繁荣实由于幕府兴盛的观点,二是利用了敦煌文献《伯2555》卷。多年来由此而不断拓展,先后写成《唐代幕府与文学》《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著作,这一研究进程也是我努力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学术方法的过程。长时间去关注一个问题,长时间去做一个专题的文献资料考辨,收获是不言而喻的。

《唐代幕府与文学》是我的第一部专著,由于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所以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傅璇琮先生非常高兴,他说“我在看到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一稿时,觉得竟有志同道合者在,不禁为之跃然。”《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出版于1994年,此书的完成对于我的学术工作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马来西亚学者赖瑞和教授在大著《唐代基层文官》中是这样说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则从墓志和唐史料中,挖掘出曾担任过文职僚佐的大约两千多人,按任职方镇排列,是一项重要的基础研究,为后来学者提供不少方便。”

陈: 近几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很热、成果很丰硕,要在重要作家和重要文学现象研究上寻求突破是难上加难,而您却不断带给学界惊喜,先后开拓了唐代幕府与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强弱势文化与文学等多个新领域,能否谈谈您的“秘诀”?

戴: 重要的是态度。也许正是基于对学问的敬

畏,促使我学术研究的严谨和多方的探索吧。我有两个立足点:一是回归文学研究,充分占有材料并灵活运用很重要,但借鉴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立足于文学研究,积极关注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二是求索创新成为一种自觉追求,是我学术发展的动力,我喜欢去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方向想不通,就反复琢磨,想从其他地方着手,不断求索是我的学术理想,也可以说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追求。

另外,对于材料我始终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总是争取从常见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掘材料提供的信息。如在关于屈原故里的材料中,有一则是最为常见的,即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中记载“屈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须庙,捣衣石犹存。”一般看来,这则记载中有关捣衣石的信息似乎没什么意义;但细读下去,发现它提示我们,捣衣石与纺织有密切的联系。女须通常理解为屈原之姊,但若将女须与捣衣石联系起来,则不难作出在“女须”与专主纺织的“嫫女”星之间有某种联系的设想。因此,我们对于女须身份的认识又多了一种解释,它还可以是主管女工、纺纱织布的嫫女星座。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我比较重视研究选题和方法的独特性,形成个性化的关注角度。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两位年长的副会长阎琦和张明非撰文《傅璇琮先生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提到“每届年会的主题发言人都是他慎重考虑后决定的,对引导并拓展唐代文学研究往往能起到推动作用。如董乃斌的宏观研究,赵昌平的诗歌理论研究,葛晓音的文学史发展理论研究,陶文鹏的诗歌艺术研究,陈尚君的唐代文献整理,戴伟华的唐方镇幕府文学研究,李浩的地域家族文学研究等,都一一进入他的视野,并安排他们作大会主题发言。”我能为唐代文学研究做好自己的工作,还是很高兴的。

陈:您最近主持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强、弱势文化形态与唐诗创作关系研究”都获得成果结项“优秀”等级,您学术成果丰硕而且质量过硬,请问您是如何保证研究项目

的质量呢?

戴:我的体会有三点:第一,全神贯注,独立完成,这样能很好地体现自己思考的系统性、全面性以及独特性;第二,有充分的资料准备,一定程度而言,材料保证了学术的质量;第三是创新,即选题创新、观点创新。比如“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改变过去文史结合过程中文史分论或重史弱文的表述结构,以文学问题立题,在文史结合中解决文学问题,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

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时有讨论,您的看法呢?

戴:我从不认为两者之间有矛盾,教学与科研是最亲密的姐妹。科研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而教学又会反逼你去从事科研。好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好的科学研究者。我在本科教学过程中,不断去思考教材中的名家名篇,上面提到的《〈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那篇论文,就是在备课时查找文献资料发现的问题。在整理教学讲义《唐诗宋词研究》时,对一些名篇又做了更贴近作品原义的解析以及艺术鉴赏,如对苏轼《水龙吟》、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作品的深度新颖解读,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引起很大反响,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网、求是理论网、中国新闻网、国学网、中国日报网、中国艺术批评网、文化中国网等十多家网站转载。我常常在课堂教学中讲授发现问题的过程,与学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也深得学生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其实,我在不同场合都提出关注文学史上重要文学现象、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这是一种职责,也含有为教学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意思。

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多年来指导、帮助过我的学术界前辈和朋友。

【责任编辑:赵小华】